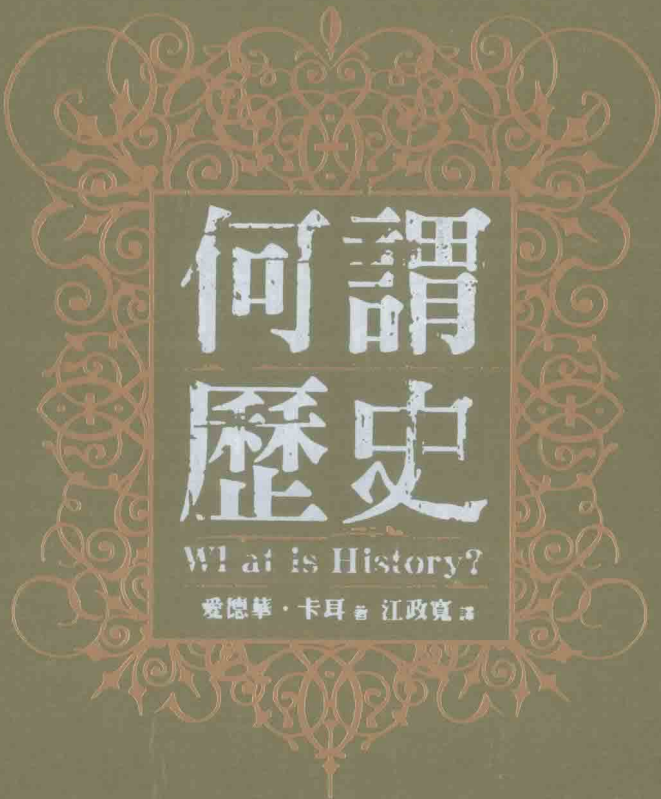




何謂 歷史

What is History?

愛德華·卡耳 著 江政寬 譯

劍橋大學現代史教授
理查·伊凡斯 (Richard J. Evans)
專文導論



歷史迴廊
005

何謂歷史？

What is History?

愛德華·卡耳 (Edward. H. Carr) 著

江政寬 譯

「我總覺得很怪，歷史大部分是杜撰出來的，它不應該如此枯燥乏味。」

——凱薩琳·莫爾蘭論歷史，（《諾桑覺寺》，第十四章）*

* 譯按：《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該書為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凱薩琳·莫爾蘭（Catherine Morland）是書中女主角。

卡耳在臺灣

江政寬

關於「何謂歷史？」這個問題，最經典的答案或許是這句話：「歷史是歷史學家跟他的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是現在跟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其不僅頻繁見諸個別的歷史著述，而且在眾多歷史網站的首頁或歷史系的網頁上，亦常見到蹤影。此一為人津津樂道的名言，便是出自卡耳（E. H. Carr, 1892-1982）的《何謂歷史？》（1961）。這部作品與臺灣讀者結緣的時間甚早，一九六八年時，王任光教授（1919-1993）就將該書譯成中文，以《歷史論集》之名發表^[1]。此後，該書可說成為歷史學門的基本教材，歷史系的莘莘學子幾乎人手一冊，而卡耳在書中的許多經典妙語，更是為人稱頌一時，歷久不衰。這本書在臺灣有多風行呢？以筆者手邊的《歷史論集》為例，一九九一年的版次是十三刷，這樣的紀錄堪稱是同類型的學術著作中最為暢銷的作品。

弔詭的是，儘管《歷史論集》在臺灣擁有不少讀者，但學界對卡耳的知識背景、寫作該

[1] 參見 E. H. Carr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一九六八。

書的動機，以及寫作時의思想和社會氛圍，實際上了解頗為有限。從〈譯者的話〉裡，我們僅能得知，卡耳出身劍橋大學，巴黎和平會議時，曾為英國代表團之一員。後來服務於外交部俄國司，英國駐國際聯盟代表團等職。他執教過威爾斯大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其間，也曾擔任泰晤士報編輯。卡耳是公認的蘇聯專家，從事《蘇俄史》的編纂。而《歷史論集》則是一九六一年元月至三月，他在劍橋大學學術講座上宣讀的六篇演講詞^[1]。由此一簡要的介紹看來，卡耳顯然是國際關係專家和蘇聯史家，但王氏沒有告訴我們的是，這類學術背景的人為何要探討「何謂歷史？」這一主題呢？還有，該書發行後引起了什麼迴響呢？

至於《歷史論集》的內容，王任光談到，卡耳在書中要答覆下述的幾個問題，比方說：

歷史家應如何處理所有事實，而使之成為可以應用的「歷史事實」？歷史家在處理歷史人物時，是否能將他們孤立起來討論？換句話說：在討論「過去」時，歷史家應如何來看「單獨」的人和事？歷史，是科學麼？歷史家應該顧慮到人的「私」生活麼？歷史上的因果關係有何解釋？歷史是進步的，抑是退步的？我們今後在歷史研究上應有什麼態度？^[2]

他進一步指出，「這些都是一個從事研究歷史的人急於知道的問題。它們是屬於歷史哲學的問題；這本書就是一本討論歷史哲學的書」^[3]。《歷史論集》出版後，史學界對於卡耳觀點的援引和討論，大體上分成兩類：其一，是證成已說式的文句引用；其二，則是少數幾篇摘要式的

敘述，其內容和主題不出王氏前述的概括，對於加深我們的理解並無實質的幫助。再者，該書嚴格而論，稱不上是歷史哲學著述，王氏五年後出版的譯作，亦即，華許的《歷史哲學》，才是道地的歷史哲學作品^[5]。不過，歷史學界向來對歷史哲學不感興趣，因而《歷史哲學》出版後流通不廣，一點也不讓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雖說卡耳是史學界狀似耳熟能詳的人物，但讀者如想進一步閱讀相關的中文討論，便會發現中文著述寥寥可數，這毋寧是一種怪事！

今日，當我們進一步審視王任光的譯本內容時，兩方面的局限便清楚浮現出來。首先，是用語和概念帶有時代的印記。尤其在許多術語的翻譯上，與當代常見的譯法出入頗大，例如，把 *empiricism*（經驗主義）譯為「實驗論」；把 *conceptual framework*（概念框架）譯為「觀念體制」；或者，把 *ideology*（意識形態）譯為「觀念」，諸如此類。人名的翻譯更是如此，比方說，蘭蓋（蘭克·*Ranke*）、巴爾森（帕深思·*Parsons*）、蒲德費特（巴特菲爾德·*Butterfield*）、蒲耳卡（布克哈特·*Burckhardt*）、迪耳代（狄爾泰·*Dilthey*）、克魯西（克羅齊·*Croce*）、脫利衛連（崔維廉·*Trevelyan*）、柯林胡德（柯靈烏·*Collingwood*）等等，如果未加上外文名，現在的讀者恐怕也不易猜出誰是誰了。

[2] 同上，頁七—八。

[3] 同上，頁八。

[4] 同上。

[5] W. H. Walsh 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臺北：幼獅，一九七三。

饒有趣味的，則是時代對王氏譯文的影響。舉例來說，「歷史是一個時代覺得另一時代裡有值得注意之事的紀錄」^[6]這個句子，王任光顯然是以後朝編纂前朝的國史概念，將其詮釋為「歷史不過是這一代紀錄前一代的事」^[7]。而「希特勒上臺執政」^[8]這樣的描述，王任光則譯為「希特勒竊取了政權」^[9]。在「反共抗俄」的時代氛圍中成長的讀者，想必對「竊取」的字眼不陌生，因為當時「共匪還竊據著大陸」。在此，王氏的譯本以另一種形式，印證了卡耳所言，歷史學家是時代的產物。

其次，除了反映時代的思想特色之外，王氏的譯法，常常取其大意，文句頗為簡約，而且頻繁出現錯誤。為了方便讀者檢索，容我附上原文以供對照。例如，「Laymen - that is to say, non-academic friends or friends from other academic disciplines - sometimes ask me how the historian goes to work when he writes history」^[10]（歷史門外漢——也就是說，非學術界的朋友，或者，其他學門的朋友——有時間我說，歷史學家寫史著的時候是怎樣著手工作的呢？）王氏譯為「研究歷史的朋友有時間我，歷史家是怎樣寫歷史的？」^[11]。又如，「In my own field of study I have seen too many examples of extravagant interpretation riding roughshod over facts not to be impressed with the reality of this danger.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perusal of some of the more extreme products of Soviet and anti-Soviet schools of historiography should sometimes breed a certain nostalgia for that illusory nineteenth-century haven of purely factual history」^[12]（在我自己的研究領域裡，我見得太多的例子，對事實置之不理，任意作詮釋，不為這種危險的現實所動。也難怪，多讀幾回蘇聯

史學學派和反蘇聯史學學派的一些比較極端作品，有時使人產生某種鄉愁，懷念起十九世紀時純然事實的虛幻避難所。」王氏則譯為「在我個人的研究範圍裡，我多次看到許多過分強調解釋而貶抑事實的例子，而不顧這種危險的存在。無怪乎一些讀到蘇聯或反蘇聯歷史家的過激作品時，不免對專重事實歷史的十九世紀感到懷念了」^[13]。

最後，再舉一例，「The title of a work by Herbert Spencer, *Social Statics*, published in 1815, is still remembered. Bertrand Russell, reared in this tradition, later recalled the period when he hoped that in time there would be 'a mathematics of human behaviour as precise as the mathematics of machines'」^[14]（赫伯特·史賓塞出版於一八五一年的《社會靜力學》，該書的書名是大家都還沒有忘記。成長於這一傳統的伯特蘭·羅素，後來回憶起有段時期，他希望將來會有一種跟機器數學一樣精確的人類行為數學」。）王氏譯為「斯賓塞的《社會靜力學》，雖出版於

[9]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p.49.。

[7] 《歷史論集》，頁四十七。

[8]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p.12.

[6] 《歷史論集》，頁十一。

[10]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p.22.

[11] 《歷史論集》，頁二十一。

[12]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p.22.

[13] 《歷史論集》，頁二十一。

[14]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p.50.

一八五一年，在今日還是一本有價值的書。受到這種傳統薰陶的羅素追憶說，他曾希望將來會有一天，『計算人的行為將如計算機器一樣準確』^[15]。只要讀者將《歷史論集》與卡耳原書作比對，就會發現大大小小的問題，通貫全書。

現在，讀者眼前的這個譯本，乃是根據四十週年紀念版譯出的。相較於未曾改版的《歷史論集》，本書的內容增加了四部分，分別是伊凡斯所寫的〈導讀〉，卡耳的〈第二版前言〉，以及卡耳的合作者戴維斯所撰的〈入門短箋〉和〈來自卡耳的檔案：《何謂歷史？》第二版的筆記〉。伊凡斯為我們清楚勾勒了卡耳當時的寫作背景，而戴維斯則告訴我們卡耳為未能完成之第二版所作的努力。這些新增的篇幅，大大填補了我們認識上的空缺，讓我們得以重新評估《何謂歷史？》在當代的價值。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本文雖指出王任光的時代局限，但絲毫沒有貶低或否定的意思，相反的，筆者對他的貢獻是推崇備至的。在取得西方學術資訊不易的年代，王氏在西洋史領域的辛勤耕耘，可說是有目共睹的。在他的學術生涯裡，除了擔任行政工作，培養新血輪之外，其編譯了四部作品^[16]，編寫了七部著作^[17]，為戰後臺灣西洋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使後生晚輩有一個較好的出發點，一窺西方史學的殿堂。拙譯便是被其餘澤下的產物。基於這樣的理由，這個譯本是獻給王任光教授的。謹以為序。

後記

本書的翻譯過程中，曾參酌了王任光和吳柱存的譯本。另外，在進行第一稿修訂時，大陸已出版了陳恆的譯本，譯者亦曾加以參酌。由於他們現有的成果使譯者得以減少很多錯誤，在此表達由衷的感謝之意。最後，譯者要感謝主編歐陽瑩小姐為本書所付出的辛勞。

卡耳重要著作一覽

1. *Dostoevsky (1821-1881): a New Biography*, London: Allen & Unwin, 1931.
2. *The Romantic Exiles: a Nineteenth-Century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V. Gollancz, 1933.
3. *Karl Marx: a Study in Fanaticism*, London: J.M. Dent & Sons, 1934.
4. *Michael Bakunin*, London: Macmillan, 1937.; 宋獻春等譯，《巴枯寧傳》，北京：中國人民大

[15] 《歷史論集》，頁四十九。

[16] 除了《歷史論集》和《歷史哲學》之外，另外兩部是：王任光、黃俊傑編，《古代希臘史研究論集》，臺北：成文，一九七九；王任光編譯，《西洋中古史料選譯》，臺北：東昇，一九八〇。

[17] 王任光，《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運動》，臺北：臺灣商務，一九六八；王任光，《中古歐洲史上之政教關係》，臺北：臺灣商務，一九七六；王任光編著，《西洋中古史》，臺北：國立編譯館，一九七六；王任光，《羅馬帝國與基督教》，臺北：臺灣學生，一九七七；王任光、李弘祺，《歷史上的封建制度》，臺北：臺灣學生，一九七七；王任光，《文藝復興時代》，臺北：成文，一九七九；王任光，《信仰與史學：王任光教授歷史著述》，臺北：稻禾，一九九六。

學，一九八五。

5.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the Peace Treati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37. 宋桂煌譯，《戰後之國際關係》，長沙：商務，一九四〇。原著再版時更名為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1947。
6. *Britain: a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Versailles Treaty to the Outbreak of War*, London: Longmans, 1939.
7.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39, 2nd edition, reissu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additional material by Michael Cox,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秦亞青譯，《二十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係研究導論》，北京：世界知識，二〇〇五。
8. *Conditions of Peace*, London: Macmillan, 1942. 王元珍譯，《和平之條件》，重慶：商務，一九四四。
9. *Nationalism and After*, London: Macmillan, 1945.
10. *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Macmillan & Co., 1946.
11. *Studies in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50.
12.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London: Macmillan, 1950-78.
1.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3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50-53.

- ii. *The Interregnum, 1923-1924*, London: Macmillan, 1954.
- iii.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3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58-1964.
- iv. (with R. W.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3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69-78.
- 13. *The New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51. · 李永熾譯，《新社會》，臺北：牧童，一九七四。
- 14. *German-Sovie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19-1939*, London: G. Cumberle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 15. *What is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1961; 2nd edition edited by R. W. Dav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6 (1987 [printing]); 40th anniversary editio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J. Evan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 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一九六八；吳柱存譯，《歷史是什麼？》，北京：商務，一九八一；陳恆譯，《歷史是什麼？》，北京：商務，二〇〇七；江政寬譯，《何謂歷史？》，臺北：博雅書屋，二〇〇九。
- 16. *1917: Before and After*, London: Macmillan, 1969.
- 17. *The Russian Revolution: from Lenin to Stalin (1917-1929)*, London: Macmillan, 1979.
- 18. *From Napoleon to Stalin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1980.
- 19. *The Twilight of Comintern, 1930-1935*, London: Macmillan, 1982.
- 20. (edited by Tamara Deutscher) *The Cominter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Macmillan, 1984.

導論

理查·伊凡斯 *

一

今日，不管用什麼可被接受的角度來看，卡耳（E. H. Carr, 1892-1982）都算不上是一位專業的歷史學家。他沒有歷史學的學位；也從未在任何一所大學的歷史學系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他在劍橋研讀古典研究。他後來坦承，他那時對歷史沒有興趣^[1]。他沒有當今進學術圈的慣用方法的博士學位。一九一六年，他一畢業便直接進了外交部，往後的二十年他一直待在那裡。這段期間，他似乎擁有遠超過當今所容許的大量空暇，而他則把閒暇花在撰寫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傳記研究。他在一九三二年發表了一本討論《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書籍，一九三三年發表了一本關於赫爾岑^[2]及其交友圈（《浪漫的流亡》）的論著，一九三七年則發表了

* 我很感謝伯明罕大學允許我使用存放於大學圖書館特藏區的卡耳檔案。我要謝謝強納森·漢斯蘭（Jonathan Haslam）仔細地閱讀了本篇導論的初稿，以及有用的建議。所有的觀點都由我自己負責。

[1] E. H. Carr, 'An Autobiography' (1980) in Michael Cox (ed.), *E. H. Carr: A Critical Appraisal* (London, 2000), pp. xiii-xxii, here p. xiv
[2] 譯按：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 1812-1870），俄國社會哲學家、政治評論家和回憶錄作者，十九世紀俄國知識分子基進傳統的創立者之一。

一部《巴枯寧》的傳記。他也開始撰寫有關當代外交的書評和文章。一九三六年，他辭去外交部工作而接受威爾斯的亞伯里斯威斯大學一個職位之時，職銜是國際關係學教授，而不是歷史學教授。

在此一頭銜下，卡耳因許多簡短但有影響力的對外政策作品而馳名於世，最著名的或許是發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二十年的危機，一九一九—一九三九》^[5]。然而，就像他任職外交部時花了愈來愈多的時間來寫書那樣，如今受聘於亞伯里斯威斯大學之時，他也花了愈來愈多的時間從事於新聞工作。一九四一年，他成為《泰晤士報》的助理編輯，而且為該報刊撰寫了很多的社論，直到一九四六年離職為止。他全職地受雇於一份全國性報刊的這一事實，可能使他不受亞伯里斯威斯雇主的喜愛，不過，正因為他的個人活動，他最後被迫辭去了他的大學職位。在一段時間以自由撰稿的新聞工作者、演講人和廣播人維生之後，他在一九五三年獲得牛津大學巴里奧學院的政治學教職，其後在一九五五年移動到他的最後一站，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資深研究員的職位，而他便待在那裡直到一九八二年以九十歲高齡過世^[6]。

因此，卡耳著手處理歷史的角度，是他為外交部和全國性報刊工作的人生。這些影響與經驗，強烈地塑造著他對歷史以及該如何研究歷史的看法。他來到歷史這個主題，在他的人生裡，相對上來說是晚了。他開始從事他唯一的大部頭歷史作品《蘇俄史》的時候，他五十歲了，該書於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八年之間，以十四冊本發行；而到了他開始撰寫《何謂歷史？》的時候，他早就過了退休之齡。他後來宣稱，他對歷史的興趣，起因於他在一九一七年